

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

1978—2015中美经济外交

罗小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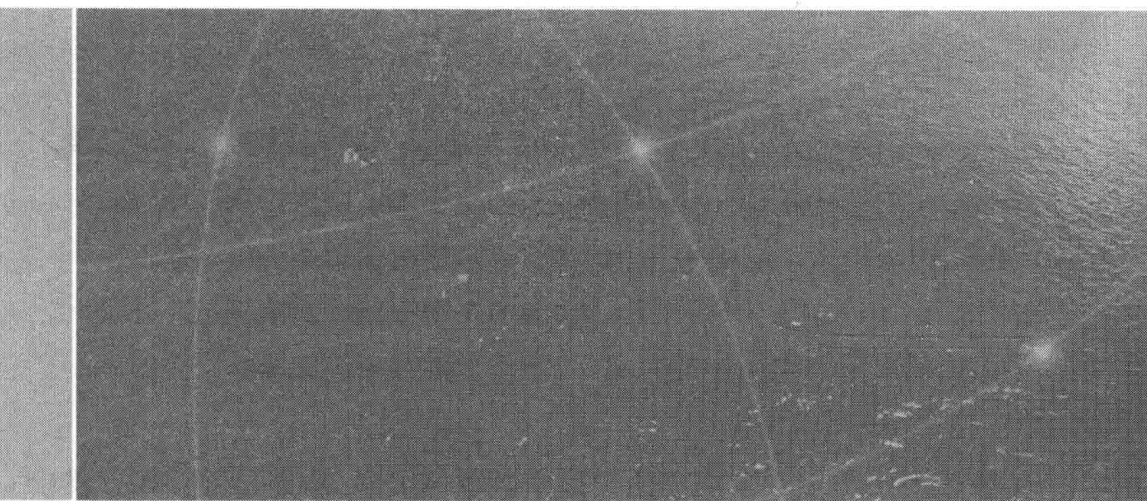
中美经济外交经历了初始化、正常化、机制化、包容化，正在竞治化——为各自发展、区域和全球善治而竞争，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正在为两国关系未来铺就道路。不必忌言责任，更无需忌讳竞争。一个经济力量上相对崛起的中国和经济力量上相对衰落的美国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的顶层结构，而中美关系决定了世界未来。

时事出版社

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

1978—2015中美经济外交

罗小军◎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 1978 ~ 2015 中美经济
外交/罗小军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80232-924-9

I. ①新… II. ①罗… III. ①中美关系—国际经济
关系—研究—1978 ~ 2015 IV. ①F125.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4020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2 字数: 325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美经济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	(11)
第一节 经济外交角度观察中美关系的理论重要性	(11)
第二节 经济外交角度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重要性	(16)
第三节 中美经济外交研究现状	(19)
第四节 中美经济外交研究的方法论	(52)
第二章 国际经济秩序与中美经济外交	(54)
第一节 经济规则竞争与中国道路选择	(55)
第二节 中美经济外交理念与策略	(59)
第三节 规则红利与中美经济增长	(62)
第四节 共同规则下的制度竞逐	(65)
第三章 经济发展、权力转移与中美经济外交	(68)
第一节 经济发展、权力转移与中美经济外交	(68)
第二节 变化中的相互依存与中美经济外交	(72)
第三节 互补分工与中美经济外交	(98)

第四章 制度建设与中美经济外交接轨	(100)
第一节 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	(101)
第二节 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	(155)
第三节 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	(202)
第四节 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	(254)
第五节 中美经济外交竞治化	(312)
第五章 经济发展与中美经济外交目标及手段	(326)
第一节 中美经济外交目标与手段	(326)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中美经济外交目标及手段的演变	(333)
第三节 经济发展趋势与中美经济外交未来目标与手段	(334)
参考文献	(336)
后 记	(345)

前 言

历史上大约有过 15 次新兴大国的崛起，其中有 11 次与既有大国之间发生了对抗和战争，即历史上一个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竞争时，最后双方多数走向战争。那么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与既有大国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在纷繁复杂的竞争、合作、冲突中迎接战争还是和平？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从而爆发战争？

中国方面率先明确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大国兴衰的历史悲剧。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更多是中国方面的主动和诚意，这种关系的关键词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 世纪 90 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展了不结盟外交，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 年 5 月 4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发表了《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提出中美伙伴关系应向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以来，新一届中国政府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态度非常诚恳，行动更加务实。而美国方面也最迟自克林顿政府以来就开始思考一个稳定和繁荣的、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才是安全的。

对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处于战略优势一方的美国的态度一直是不公开否认也不公开接受。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为关键的任务是要理顺中国崛起与美国守成的关系，这一关系是中美

关系的基本结构特征。结构决定行为，行为规范结构演变结果。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先不管美国政府的接受诚意，仅从经济外交角度观察中美两国的持续努力，可以发现，30多年来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路上，正在为中美全面新型大国关系铺就道路、铸就压舱石。

一、走出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的历史窠臼

美国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国家，所谓守成的美国是从国际体系层面而言，尤其从美国是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革新者这一角度而言。中美经济关系的崛起和守成，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来观察。

客观上，中国经济在绝对强势崛起中，美国在相对衰落中。从千年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166倍，120年后的1820年是其18倍，80年后的1900年是其0.7倍，1950年是其0.2倍，2001年为0.6倍，2015年预计为1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公布的报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经与美国相当。

把最近30多年历史放大来看，中国经济迅速崛起，1978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8%，2013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55%，2015年是美国的70%；1978年中国名义GDP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2013年占11%，美国197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5%，2013年占21%，尤其是根据IMF统计，2007年起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美国经济相对衰落，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同样按照名义GDP计算，基于中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历史轨迹预测未来，最早于2025年左右中美经济总量相当，2087年左右中美贸易相互依存达致对称性地位。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中美经济存在巨大差距，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767美元，美国人均

为 53152 美元，中国人均 GDP 是美国的 12.73%，2013 年美国
经济总量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的日本、第四的德
国的经济量总和相当，全球经济格局总体依然是一极的世界。
尽管差距巨大，但背后隐藏的趋势仍然是显著的，即一个经济
力量上相对崛起的中国和经济力量上相对衰落的美国正在重构
世界经济的顶层结构。

中美经济的崛起和守成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此起彼
伏，更重要在于主观层面，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和主张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主导当前秩序的恰恰是美国，美国是这一
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坚守者。这从主观层面构成了崛起国家与守
成国家的最重要特征，即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的挑战国和霸
主国。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就是要避免走过去崛起国家和守成
国家走向冲突的老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新”，在于不
同于一战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那样走向战争，不同于二战后不
同经济社会制度的苏联和美国这一对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走
向冷战，也不同于二战后具有相同经济社会制度的美国 and 德国、
日本的经济崛起之间的博弈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不同
经济社会制度之间的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的微妙关系，除了
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外，还牵扯到价值观、基本经济制度和意识
形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和技巧。

二、接触和开放政策的相互拥抱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不冲突的大国关系，结构现实主义
很好地分析了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间是否会发生冲突的原因。结
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认为，除了国际体系的规则和结
构变化外，在一个缺乏权力中心和相互依存失范的国际体系里
面，行为主体最容易发生冲突。借用结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从

国际体系的系统规则、系统结构、权力中心、主体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与对相互依存的规范——中美经济外交的制度建设，这四个角度出发观察，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中美两国间生长。

就体系的系统规则而言，冷战结束前，世界格局和秩序可以概括为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即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就国际体系而言，世界其实有两大阵营两种规则，第三世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却由于实力局限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经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圈子。1956年，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开始思考跳出苏联模式开创中国特色道路，期间历经曲折。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寻求主动融入西方国际社会圈子，这一圈子毋庸置疑是美国主导的，1978年中国做出这一历史抉择，1979年中美建交，随后加入IMF、世界银行（WB），并积极争取复关。随后苏联解体、冷战基本结束，放眼世界大势：1992年中国终于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复关”（GATT）谈判获得实质性推进，2001年中国“入世”，完成融入国际社会一大步；而美国自从里根政府开始了明确的对华接触外交，希望把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去，期间这一大方向历经波折有过游移，但克林顿政府最终又回到了对华接触外交，200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中国入世过渡期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体制的一个成员，作为成员将会起到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公开措辞承认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性。2014年12月17日，中国国家副总理汪洋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已经主导世界经济的体系和规则。中国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这个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至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中国确认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中美已经认可了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的规则——经济市场化与自由化，和这一规则下的制度安排：联合国（UN）、IMF、WB、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体系规则面前，中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积极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经济外交理念相互吻合；策略上，美国对华接触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美经济外交策略相互拥抱，这构成了中美经济外交近 40 年来的宏观写照。中美此后的制度建设都是在这一系统规则下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竞争性补充和完善，诸如：美国主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中国主推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美各自发展水平和资源能力的差异，导致中美在推进区域和全球治理方面的着力点不一样，美国推进的是自由化这一规则的深入发展，类似 WTO 的区域升级版，中国推动的是发展性基础设施，类似 WB 和 IMF 的区域版。在这种竞争中，中国方面主动褪去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更多是直接利益之考量，扎扎实实地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TPP 就产权这一基础经济制度上对国有企业设立了准入限制的门槛，这对国有企业居于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中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不过，目前中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跨境双向投资的便利化改革，或许能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障碍。从较长时间而言，就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推行一样，中美不会在这些基本经济制度上有实质性差距，中美在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上不会存在重大分歧，但规则上的认同并不意味着没有实际利益分歧，如何有效管控分歧、使得分歧保持在某个“走廊内”成为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

三、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着轨运行

从体系的系统结构层面而言，尽管如前所述，美国经济总量

是全球第二、第三、第四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的总和，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权力中心，且地位短期内不可动摇，这种经济权力中心的地位稳固也能够避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发生冲突，但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逐渐减小，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带来权力转移和责任的转移，带来了渐进的全新的变化。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相生的，这一过程蕴含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变化中，并通过相互依存的变化来体现。而回顾中美经济外交近40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一直处于生长中。这种生长，通过相互依存的发展和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即对相互依存关系的规范，体现得一览无余。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的着轨运行，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相对开放，为权力转移提供了包容性，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构建具备制度基础，这铺就了中美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

中美建交前后至今的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8年，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1989—2000年，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2001—2007年，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2008—2012年，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2013年至今，中美经济外交竞治化。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以中美建交和确立经济利益对于战略三角的优先重要性、1980年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和签署中美贸易协议等为标志；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以中美经济关系“政治脱敏”、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脱钩、1995—1996年中美经贸往来免受台海危机的影响、1999年中美确立PNTR（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等为标志；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中美贸易以WTO为底层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顶层机制，其他双边、多边对话为中层机制，构成了多层次的机制化结构，有效地规划和建设中美经济关系；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以美国认定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制的一员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中国公开文件认可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以中美在国际经济治理组织中按照组织原则调整在IMF、WB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共同治理经济危机，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为标志；中美经济外交竞治化，

以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建设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完善全球治理为标志，以中国先后落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金砖银行，提出了丝路基金、亚太梦想为标志，有效弥补和完善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全球治理，以自身能力承担更多责任，呼应了美国一再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促进全球善治的呼吁，这一呼吁自“9·11”前后由小布什总统明确提出，且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提出，这与尼克松自二战后首次呼吁盟国分担国际责任大有不同。从要求分担责任而言，可以理解为世界是大家的，靠大家建设，美国为何要把大部分成本都往自己身上揽呢？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力有未逮，还可以理解为美国是开放和包容的、与时俱进的。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行动，会有不同的格局。2014年9月奥巴马在接受皮特逊经济研究所就伊朗问题采访时抱怨道：“中国是在搭便车，而且已经搭了30年，这种方式让他们很受用。”^① 随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来访外国元首时向国际社会表示，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② 大国外交，崛起和守成，一句话见分晓。与奥巴马等要求中国承担责任不同，美国国内也有担忧中国因为承担国际责任而给美国在当地利益带来竞争，这种担忧的典型代表言论是奥巴马总统2015年1月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正想要给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地区确立规则”，“这会给我们的工人和商业带来不利。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发生？我们应该来书写规则，我们应该来定义游戏规则”。^③ 美国一边要把中国融入到世界体系中、并要求中国承担

① 奥巴马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搭便车，<http://www.nytimes.com/video/opinion/100000003047788/china-as-a-free-rider.html>。

② 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发表演讲《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http://news.china.com/focus/xjpcfm/11165598/20140822/18731870.html>。

③ 奥巴马2015年国情咨文演讲，<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20/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january-20-2015>。

更多责任，一边又担心中国因为承担责任而对美国利益形成竞争。中国在区域公共产品提供上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一，要求中国分担责任是美国的要求，但如何分担责任存在分歧，对中国分担责任的行动和付出，美国应该乐见其成；其二，在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区域，从经济的绝对利益上、尤其从投资水平上来说，美国仍然居于领先地位，美国也是这些区域繁荣的分享者；其三，中国提供公共产品有助于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安全和稳定也符合美国的区域根本利益；其四，中美此种竞争，有利于促进全球和区域经济善治，提升自由化水平，从而惠及区域和全球经济，但如果因此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是一种不明智的策略。

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的五个阶段，展现了一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轨迹，虽然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直到近年才重点提出，这与中国经济发展实力提高和能力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自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面临这样的课题，而只有在中美实力更加接近的当下，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才更加凸显。

四、中国大势：开放与市场化

中国内外都有人担心中国改革方向，毕竟任何一种改革都面临各种力量的博弈，习近平与奥巴马瀛台会晤时还谈到改革不成功的光绪皇帝被囚禁于此的故事，令奥巴马感叹改革不易。从系统规则的红利而言，中国必将进一步主张和推进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国际经济自由化。这一点只要留心一下从1950年到目前的中国GDP增长曲线就可以发现。1992年以前，基本是一条匍匐前进的直线，1992年后中国增长曲线开始可以观察到斜率，大概有那么几度，2001年后这个斜率大概是50度左右，规则之下增长红利显而易见。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对中国的长远方向，保持开放和市场化的方向，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士，都无需怀疑。

中国“入世”更是获得了不菲的红利，“入世”后中国在世

界经济比重的份额增速比美国大，以至于美国有人痛心疾首说，中国获利太多，WTO 利益分配不平衡，因此保护主义和“眼红”主义大大抬头，舍全球化转而要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安排（FTA），比如 TPP、TTIP，因此就利益而言而不是意识形态而言，当下中国是全球经济自由化更为坚定的推进者。进一步的证据会表明这一点，中国虽然“入世”获得不菲红利，全世界有 100 多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世界上 80% 左右的市场即美国和欧盟市场没有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按照“入世”协议，2016 年，WTO 成员方自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此后中国企业将能够更加自由地驰骋于全球市场。投资也一样，中国与上百个国家签订了 BIT（双边投资协议），但与欧盟和美国这两个区域大市场没有签署，中国目前与发达国家签署 FTA 的有新西兰、冰岛和瑞士，2014 年中日韩投资协议正式生效，2014 年第二十二届 APEC 首脑峰会期间中韩签署了 FTA 框架协议。也就是说，2016 年中国在世界贸易领域将享有 Fairplay 的待遇，中国人到其他国家做贸易的门槛普遍降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红利有望大大提升，但如果在投资领域取得更多的双边或者多边协议，必将大大便利中国企业“走出去”，便利中国资本在全球崛起。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了，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能在全球真正崛起，实现中国梦和国家民族复兴。我们期待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更多进步。对中国经济外交而言，下面关键一环是中美 BIT 和中国欧盟 BIT 的谈判和签署。

所以，国内人士、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美国友好人士不必过于担忧和疑虑中国的改革方向，开放和市场化是中国的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中国的繁荣也将惠及美国，就像中国成为了 WTO 成员一样，中国必将会成为 TPP 级别的“玩家”，不管中国要定义的区域一体化是叫 TPP 还是 APEC 亚太梦想，方向都是一样的，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国情的复杂性、双边谈判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仍需要时间。定义一个区域一体化安排，还要看实力，看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推进区域或全

球善治，对于崛起国家而言，不仅会有合作有时更会有竞争，美国提供了全球系统的制度安排，中国现在也有能力在区域层面提供公共产品，这种制度互补和竞争，更接近国际体系生态系统的进化，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全球善治。中国政府坐拥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责任也有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区域公共产品，推进区域和全球善治。对此，我们都要乐见其成，不忌讳责任，不忌讳竞争，竞争是生态进化自然之道。

尽管美国政府没有公开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措辞，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明确提出“世界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主要看大国是否战略误判，而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的奥巴马也第一次明确回应中美关系的结果不会是“修昔底德陷阱”。

竞争、合作与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状态，无论一些舆论如何夸大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紧张，公众层面——美国人民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2014年公映的《星际穿越》、早前的《2012》都把最后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大地，以及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合作上，这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言只是好事不是坏事。一条大道的基石已经铺就，中美究竟能够建成什么样的大国关系，且待更多理论和实践探索，不必着急，也不能松懈和犯大错。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

第一章 中美经济外交与 新型大国关系

观察和把握中美关系，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在明确决定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力量的基础上，把握影响中美关系演变关键力量的客观和主观因素，进而在主观层面积极作为，朝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迈进。

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表明，导致国家间力量变化的关键力是经济力量的变化，而形成何种国家间经济关系，经济外交的作用甚大。因此观察中美经济外交、如何开展中美经济外交是探索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和关键。本书将运用结构现实主义分析工具，对中美经济外交、中美经济关系和中美关系进行观察和分析。

第一节 经济外交角度观察中美 关系的理论重要性

一、经济关系角度观察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研究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关键是研究国家间经济力量的对比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国际关系已经从过去以军事力量为主的权力的竞争转变为以经济力量为主的

财富竞争，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尤其凸出。^①

经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认为，国际关系可以简要归结为围绕权力和财富两大核心内容而展开。^② 国家间关系是围绕权力和财富而展开的竞争，财富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工业和经济力量的消长决定了国家间权力的转移。^③ 因此，经济力量最终决定了政治权力的消长和变迁。在权力与财富两大核心内容中，对财富的追求和财富的多少是国家间竞争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理解和把握两国关系的主线索。探索大国兴衰规律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选取了最近 500 年世界历史以观察经济与战略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与大国兴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④ 因此研究国家间战略，特别是大国兴衰，要抓住主要矛盾，必须研究其经济力量即财富的消长和经济关系。这三项经典研究的结论恰好首尾相连：围绕财富和权力而展开的竞争与合作是解释、洞察和把握两个国家关系的关键；工业和经济力量的消长决定了权力的转移方向，因此国家间经济力量的变化决定了国家间权力的转移，研究权力和权力转移必须研究经济；大国兴衰交替的关键力量是经济力量，因此研究经济力量的变化及相互关系是研究大国关系的战略视角。概而言之，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权力和财富，国家所拥有的财富背后所体现的经济力量的规模变化，决定了权力在国家间转移的方向和数量，经济力量兴替变化的结果，就是原有大国的衰落和新生大国的崛起，大国兴衰的一个周期完成，新的兴替周期开始。

研究国家间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进行。经济力量的对比变化，从主观上而言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实践，其国内经济战略是主要的，但自有国家间经济

① 游碧竹：《经济外交初探》，《湖南社会科学》，1999（5）：4。

② Thomas D. Larison, David Skidmor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Wealth*.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konpf, Inc, 1958.

④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前言，第 2 页。